

唐宋名家文集

苏辙集

国学经典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国学经典

唐宋名家文集

苏辙集

何新所 注译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名家文集·苏辙集/何新所注译.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0. 4
(国学经典)
ISBN 978 - 7 - 5348 - 3319 - 9

I. ①唐… II. ①何… III. ①古典文学—作品集—中国—唐代②古典文学—作品集—中国—宋代③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北宋 IV. ①I214. 01②I264. 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5016 号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河南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40mm×960mm 1/16 **印张:**16.75

字数:190 千字 **印数:**1—5200 册

版次: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唐宋名家文集·苏辙集

前言

在“唐宋八大家”这一重要的古代散文创作集体中，三苏父子是唯一的在古文创作上取得不凡成就的文学家族。当初苏洵携苏轼、苏辙来到东京开封，凭借着张方平等的推荐、欧阳修等的揄扬，加上次年苏轼、苏辙在科举考试中双双高中，一时三苏父子“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遂擅天下”（欧阳修《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并序》）。特别是苏轼，当时欧阳修就发出了“老夫须放他出一头地”的感叹，欧阳修晚年更是带点伤感地说：“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朱弁《曲洧旧闻》卷八）而在南宋时期，苏文代替《文选》，成为士子争相效法的榜样。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就记载了这样的谚语，北宋时是“《文选》烂，秀才半”，而南宋时却说“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不过，这些历史故事多多少少显得好像苏洵和苏辙沾了苏轼的光似的，是也？非也？

下面我们来简单地介绍一下苏辙的生平经历及其散文艺术。

苏辙（1039—1112），字子由，晚号颍滨遗老，北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蜀地苏氏家族是初唐著名诗人苏味道（648—705）的后裔，苏味道在唐中宗神龙初年被贬为眉州刺史，其一子留在眉山，成为蜀地苏氏家族的始祖。苏味道是河北赵州栾城人，所以

苏氏父子也常常称自己是“赵州苏氏”或“栾城苏氏”，苏辙更以“栾城”来命名自己的文集。当然到了苏洵的时候，苏味道的影响早已经淡去，而对苏洵父子三人产生深刻影响的，应该是苏洵父祖辈所持有的独特人生观念。据苏洵《族谱后录下篇》（《嘉祐集笺注》卷一四）所记，苏洵高祖苏斩“以侠气闻于乡间”，曾叔祖苏宗晁“轻侠难制”，祖父“最好善”，苏洵的父亲苏序“喜为善而不好读书”、“晚乃为诗……豁达伟人也。性简易，无威仪”。从苏洵记述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体会到苏氏家族在唐末五代西蜀地方社会中并不是一个显赫的、文化程度很高的家族，但是颇有自己的家族传统，好侠为善，在地方上也颇有声誉。自从苏洵的兄长苏涣科举高中，走出蜀地以后，这个家族才开始急遽上升。苏洵少年时也不是一个喜爱读书的人，《三字经》中说的“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就是关于苏洵的著名典故。苏洵少年时虽则不喜学习，但是其父对他并没有严厉约束，而是“纵而不问”。只是到了二十多岁的时候，他才“大发愤”，折节读书，参加科举考试。这里有一个历史的巧合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在苏洵二十八岁那一年（景祐三年，公元1036）的十二月十九日（这一天为公元1037年1月8日），中国文化史上璀璨夺目的一颗巨星苏轼诞生了。两年以后，苏辙也出世了。这告诉我们，苏轼、苏辙兄弟的幼年时期，正是其父苏洵发愤读书的时期，或许这对苏轼兄弟的幼年教育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当苏洵四方游学之时，他们兄弟二人则受到母亲程夫人的严格教育。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后集》卷二二）中说：“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这段话向来是论证苏轼少有大志的材料，而对苏辙亦当如此看待。苏洵在科举失败后，回到家乡，

闭户读书近十年，研读经典，揣摩时事，潜心写作。这一时期，正是苏轼兄弟进学的关键时期，开始由苏洵亲自教授二子学习作文，后来当苏轼学成之后，则苏辙以兄为师。正是这样的经历，使得兄弟二人风雨同舟，建立起令后人极其钦羡的兄弟深情。苏轼在乌台诗案期间写的“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感动过历代多少的读者啊！当然，兄弟二人的性情也不尽相同，大苏豪迈俊爽，小苏则沉稳俊秀。这一点，苏洵早在给兄弟二人命字的时候就说过：“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名二子说》，《嘉祐集》卷一五）杨慎说：“观此，老泉之所以逆料二子之终身，不差毫厘，可谓深知二子矣！”（《三苏文范》卷四）嘉祐二年（1057）在欧阳修主持的贡举考试中，兄弟双双金榜题名；嘉祐六年（1061）的制举考试，两人再次入等，文名震动京师，开始步入仕途。苏辙曾参与王安石的变法，但与王安石观点不同，很快退出，在地方做官。当神宗去世，哲宗继位，宣仁高太后听政，启用旧党人物司马光执政，宋代政治进入元祐更化时期，苏轼兄弟开始进入中央，参与当时的一些政治事务。特别是苏辙这一时期升迁颇快，历任右司谏、中书舍人、户部侍郎、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等官，并于元祐六年（1091）二月任尚书右丞，次年六月任门下侍郎，直至绍圣元年（1094）三月，成为当时的执政大臣之一。苏轼兄弟在新党执政时，对于王安石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深为不满，但是对旧党上台以后司马光推行的彻底废除新法的措施同样不苟同，而是希望实行渐进式的改革，考虑人民的利益，维护国家的稳定。因此苏辙反对司马光彻底废除王安石所推行的雇役、科举等改革，认为应该认真调查研究，再决定如何实施。他反对文彦博等人提出的“回河”之议，反对吕大防、刘摯的开边之谋。对于某些

旧党中人提出的兼用新、旧党人的“调停”之说，极力反对，认为君子、小人不可同朝而处，犹如“薰莸不可同器”。虽然苏辙所论不见得都是正确的，但表现了他特立独行、不党不伐的君子人格。所以秦观称赞他“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答傅彬老简》）。但是随着宣仁高后去世，哲宗亲政，新党再次上台，旧党人物无可避免地被远贬南荒。苏辙先后被贬谪到广东雷州、循州。直到徽宗即位以后，才被赦免，允许任便居住。这样苏辙于元符三年（1100）年底开始在颍州（今河南许昌）居住，直到去世。因此他晚年自号“颍滨遗老”，闭门谢客，度过余生。

苏辙一生宦海沉浮，但笔耕不辍，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著作，今存《栾城集》、《后集》、《第三集》共八十四卷，《栾城应诏集》十二卷以及《诗集传》二十卷、《春秋集传》十二卷、《老子解》二卷、《古史》六十卷、《龙川略志》十卷、《龙川别志》八卷等。苏辙在文学、学术方面均取得了巨大成就。当然，苏辙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散文创作，下面介绍一下苏辙散文创作方面的成就。

苏辙的性格和苏轼不同，其文风也不一样。对于苏辙文风把握得最清晰到位的莫过于苏轼。当时有人认为苏辙之文不如其兄，苏轼说：“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苏轼文集》卷四九《答张文潜县丞书》）“汪洋澹泊”、“一唱三叹”、“秀杰之气”，这些审美概念非常传神地概括了苏辙散文的美学特质。明代茅坤则说得更为形象，他说：“苏文定公之文，其铎削之思，或不如父；雄杰之气，或不如兄。然而冲和澹泊，迢逸疏宕。大者万言，小者千余言。譬之片帆截海，澄波不扬，而洲岛之参错，云霞之蔽亏，日星之闪烁，鱼龙之出没，并席之掌上，而绰约不穷者，已西汉以来别调也。”（《唐宋八大家文钞·颍滨文钞引》）文如其人，苏辙的散文也许更接近欧阳修“纡余委备”的

风神。这在他的论说文和杂记、书信、传记文中都有鲜明的表现。

苏辙的论说文不像苏洵那样笔势凌厉，纵横强辩，而是通过自己特有的一唱三叹、一波三折的方式，使自己的观点为读者所接受。比如其晚年写作的《历代论》中的《唐太宗》一篇，该文目的是讨论唐太宗李世民的施政得失，文章一反常规，提出唐太宗“不知道”的鲜明观点，可以说是别出心裁，让人耳目一新。苏辙在具体论证时表现出高超的技巧，文章一开始先扬后抑，首先称赞太宗的贤能是“西汉以来，一人而已”，又说他是“三代以下，未见其比也”。然后根据太宗身后唐王朝的兴废，断言太宗“未闻大道”，对比鲜明，引起读者阅读的欲望。但文章并没有顺流而下，而是先宕开一笔，转而举出了文治武功都不足以和太宗相比的楚昭王的例子，从正面说明什么是“知大道”的君王。接着才进入正题，举出四件太宗处理不当、遗患无穷的例子，来证明太宗之“未闻大道”。这些例证确凿有力地支持着作者的观点，让读者不得不认同之。文章观点鲜明，逻辑结构相当清晰，如老吏断狱，鞭辟入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又如苏辙嘉祐五年（1060）应制举考试时所进献的五十篇策论中的《民政策上二》，文章的中心是反思宋代的科举考试，对于以诗赋、经义取士提出质疑，认为取士的途径和取士的目的不相符合。针对这样的问题，苏辙提出了恢复西汉时期开始施行的孝悌之科的对策。就苏辙提出的对策本身而言，应该说是比较缺乏现实可行性的，也算不上新鲜。但是作为一篇策论，文章非常典型地表现出了苏辙散文千回百折、虚实相映的特色。文章分为前后两个大的部分，前一部分论古，后一部分谈今；每部分又各分两层，各各虚实相映，摇曳吞吐，姿态万千。第一段写周和秦相去不远，但民风各不相同，此为实写；然后虚写一句“臣窃知其故”，却不肯道破，此为虚写。第二段写周、秦民风的不同于上层统治者的驱使，但是驱民有术，却又不肯直道出是何术，这是虚写；然后才实写驱民之术，其精彩之处在于，他认为无论是周

还是秦，其驱民之术都是使用利益驱动机制，只是目的不同而已。而这一部分整体上又是全文虚写的部分。第三段写宋朝统治者不善驱民，却用放牧牛羊不得法来虚写，然后才实写宋朝科举取士之不当。第四段不先写如何才是恰当的取士方法，反倒先写要用利禄来吸引人才行仁义；最后才正式亮出自己的底牌：复孝悌之科。真可谓极尽逗引之术。正如刘大櫆所说：“子由之文，其正意不肯一口道破，纡徐百折而后出之，于此篇可见。”

苏辙的杂记文、书信、杂传等叙事性文章更典型地反映出苏辙散文汪洋澹泊、一唱三叹的审美特色，也是其散文成就最高的部分。如其名篇《上枢密韩太尉书》，文章作于苏辙十九岁时，他刚刚进士及第。虽然是少年之作，但却显示了苏辙博大的胸襟抱负和相当成熟的写作技巧。苏辙说自己“生好为文，思之至深”，又说自己“百氏之书无所不读”，又说“且夫人之学也，不志其大，虽多而何为？”在在都表现了他的壮怀和雄心，使文章显得高亢而有精神。但文章更引人瞩目的则是其表达技巧方面的特点。《古文观止》评论本文的特点说：“注意在此，而立言在彼。”所谓“立言在彼”是指文章开头就提出的观点：“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好像本文是要谈论文学创作方面的事情。实则并非如此，本文真正的“注意在此”的“此”却是“愿得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也就是能够拜谒韩琦。那么，苏辙如何由“彼”及“此”呢？这中间使用的方法就是层层陪衬。《古文观止》评论本文说：“意只是欲求见太尉，以尽天下之大观，以激发其志气，却以得见欧阳公，引起求见太尉；以历见名山大川京华人物，引起得见欧阳公；以作文养气，引起历见名山大川京华人物。”所以，我们可以说本文是一个倒叙的结构，线索却如草蛇灰线，需要琢磨才能明了其用意所在。张伯行评本文说：“其行文顾盼自喜，英气勃勃，自是令人倾服。”可以说本文既显示了少年苏辙英姿勃发

的气概，同时也显露出苏辙散文纡余委备、一唱三叹的独特风味。苏辙散文的汪洋澹泊的表面之下，也包含着他的“秀杰之气”。苏辙在有些作品中也表现出他风格的丰富性来，比如苏辙的名作《黄楼赋》。本文的写作，在当时曾经引起过一些猜测，有人怀疑本文是苏轼代作的，为此苏轼曾特意作出声明，他说：“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作《黄楼赋》，乃稍自振厉，若欲以警发愤愤者。而或者便谓仆代作，此尤可笑。”（《苏轼文集》卷四九《答张文潜县丞书》）这是由于本文的风格和苏辙一般的文风大不相同所致。苏辙的散文汪洋澹泊，简约含蓄，不事藻绘，而本文则铺张扬厉，弘壮高华。苏辙晚年说：“余《黄楼赋》学《两都》也，晚年来不作此工夫之文。”（苏籀《栟城遗言》）可见本文的写作是特意模拟汉代大赋的风格。本文写登上黄楼，眺望徐州山川形胜一段，东望则连山参差、南望则戏马之台、西望则山断为垓、北望则泗水潏漫，显然是对汉代京都大赋的摹写。同样采用“铺采摘文、体物写志”赋体手法。当然，本文还是鲜明地体现了时代风格和苏辙的个人风格。赋体文学从骚体赋、大赋、抒情小赋、骈赋、律赋一路发展过来，到宋代欧阳修以后，出现文赋，赋体也受到古文的影响，变得更加流美平畅，本文同样如此，文章中没有汉大赋那样多的生僻险怪的字句，读起来声情并茂，摇曳多姿。本文同样也体现了苏辙散文纡余婉转的特色。文章描写部分富于诗情画意，引人入胜。如“西望则山断为垓，伤心极目，麦熟禾秀，离离满隰，飞鸿群往，白鸟孤没，横烟澹澹，俯见落日”一段，写景如画，意境优美，完全不再是汉大赋的作风了。张耒《赠李德载》（《张耒集》卷一二）诗云：“长翁波涛万顷陂，少翁巉秀千寻麓。”后人说苏轼诗文如潮如海，那么我们也不妨说苏辙的散文如萦回的河流、荡漾的湖泊、峭拔的山峰。

根据整套书的体例，苏辙的散文从茅坤所编的《唐宋八大家文

钞·颖滨文钞》中进一步进行选编，然后进行注释和翻译。这一程度上限制了选者的手眼，使苏辙某些著名作品，如《御试制策》、《超然台赋》、《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等没有能够包含进来，多少有些遗珠之憾。但茅坤所选也基本上保证了本选本不至于阑入不太成功的作品。对于作品本身的文本则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栞城集》（曾枣庄、马德富点校）为底本并进行了一些对勘，注释方面比较多地参考了高海夫先生主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以及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限于体例不能一一注明，谨在此致以谢意。作品的题解、注释、译文中既综合了各家之见，同时也包含了个人千虑一得之管见，希望能够近于是而已，但限于学力和时间，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诸君多多指正。

唐床八大家文钞·颍滨文钞引

苏文定公之文，其纚削之思，或不如父；雄杰之气，或不如兄。然而冲和澹泊，遁逸疏宕。大者万言，小者千余言。譬之片帆截海，澄波不扬，而洲岛之棼错，云霞之蔽亏，日星之闪烁，鱼龙之出没，并席之掌上，而绰约不穷者，已西汉以来别调也。其《君术》、《臣事》、《民政》等篇，尤为卓犖。予读之，录其《上皇帝书》及札子、状十九首，与他执政书十首，诸论及历代古史名论八十二首，策二十五首，序、引、传七首，记十二首，说、赞、辞、赋、祭文、杂著十一首，厘为二十卷。归安鹿门茅坤题。

颍滨本传

苏辙字子由，年十九，与兄轼同登进士科，又同策制举。仁宗春秋高，辙虑倦勤，因极言得失，而于禁庭之事，尤切。考臣胡宿以为不逊，请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其谓我何？”宰相不得已，置之下等，授商州军事推官。徙大名。神宗立之二年，辙适除丧，上书言事得召对。

时王安石与陈升之领三司条例，命辙为之属。吕惠卿附安石，辙与论多相牾。安石出《青苗书》使辙熟议，辙曰：“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如此，则恐鞭捶必用，州县之事不胜烦矣。唐刘晏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有贱必粜，有贵必粹，以是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此常平旧法，公诚举而行之，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当徐思之。”

既逾月，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奏乞度僧牒，于陕西漕司私行青苗法，与安石意合，于是青苗法遂行。辙以书抵安石，力陈不可，触其怒，徙他职。后坐兄轼以诗得罪，谪监筠州盐酒税，五年不得调。移知绩溪县。

哲宗即位，召入。元祐元年，为右司谏。蔡确、韩缜、章惇，辙皆论去之。而吕惠卿亦被论从窜典。司马光欲复差役，辙言行之徐缓，乃得审详。光又欲改安石新义试士格，辙言进士来年秋试，日月

无几，徐议元祐五年以后格式未晚。光皆不能从。

初，神宗以夏国内乱，用兵攻讨，乃于熙河增兰州，于延安增安疆、米脂等五砦。二年，夏遣使相继来，朝廷知其有请兰州五砦意，大臣议弃守未决。辙言一失此机，必为后悔。于是朝廷许之，夏人遂服。迁起居郎、中书舍人。

朝廷议回河故道，辙为公著言河决而北，自先帝不能回，今乃欲取而回之，是谓智勇势力过先帝也。进户部侍郎。辙因转对，言曰：“财赋之原，出于四方，而委于中都。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其次藏之州郡。熙宁以来，言利之臣，不知本末，内帑别藏，虽积如丘山，而委为朽壤，无益于算也。”寻又言：“数十年以来，利权分，而用度无艺，愿罢外水监丞，举河北河事及诸路都作院皆归转运司，至于都水、军器、将作三监，皆兼隶户部。”从之，惟都水仍旧。

朝议以元丰吏额冗滥，命辙量事裁减。辙曰：“此群吏身计所系。”乃具以白宰执，请据实立额，缺者勿补，不过十年，羡额当尽矣。代轼为翰林学士，寻权吏部尚书。使契丹还，为御史中丞。

时元丰旧党多起邪说，以摇撼在位，吕大防、刘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谓之“调停”。宣仁后疑不决，辙面斥其非，复上疏云云。宣仁后命宰执读于帘前，曰：“辙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极中理。”诸臣从而和之，“调停”之说遂已。

辙又奏言：“大臣宜正己平心，无生事要功，因弊修法，以安民靖国。”

六年，拜尚书右丞，进门下侍郎。初，夏人相继求和，朝廷许约地界，久之不决。夏人乃于疆事多方侵求，熙河将佐范育、种谊等遂背约，西边骚然。辙乞罢育、谊，别择老将。宣仁后以为然，大臣竟主育、谊，不从。

辙又面奏云云。会熙河奏：“夏人十万骑压境，杀人三日而退，乞因其退，急移近里堡砦于界，乘利而往，不须复守诚信。”下大臣

议。辙与吕大防、刘摯极辩用兵曲直。复上奏曰：“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臣欲诘责帅臣生事耳。”后屡因边兵深入夏地，宣仁后遂从辙议。

时三省除李清臣吏部尚书，给事中范祖禹封还诏书，三省复除蒲宗孟兵部尚书。辙奏：“前除清臣，给谏纷然，争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此与去年用邓温伯无异，恐朝廷自是不安静矣。”议遂止。

绍圣初，哲宗起李清臣为中书舍人，邓润甫为尚书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复言熙丰事，以激怒哲宗。会廷试进士，清臣撰策题，即为邪说。辙谏谓：“事有失当，何世无之。父作之于前，子救之于后。前后相济，圣人之孝也。”且及汉昭变武帝法度事。哲宗以为引汉武方先朝，不悦。落职知汝州，再责知袁州，未至，降秩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三年，又责化州别驾、雷州安置，移循州。

徽宗即位，徙永州、岳州，已而复太中大夫、奉祠。蔡京当国，又降秩罢祠，居许州，再复太中大夫，致仕。筑室于许，号颍滨遗老，自作传万余言。不复与人相见，终日默坐，如是者几十年。卒，年七十四。追复端明殿学士。淳熙中，谥文定。

辙性沉静简洁，为文汪洋澹泊，似其为人，高处殆与轼轧。其使契丹也，馆客能诵其《茯苓赋》及洵、轼文云。所著《诗传》、《春秋传》、《古史》、《老子解》。居许时，乃成编。又有《栾城文集》，并行于世。既入党籍，诏毁三苏文。三子：迟、适、逊。族孙元老。（按，《苏辙传》见《宋史》卷三三九，本文乃撮合《宋史》本传和苏辙《颍滨遗老传》而成。）